

第一章 西周陕西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从公元前 11 世纪末到前 8 世纪,是我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

周是兴起在渭水中游周原地带的一个古老部落。周原的范围,当北至岐山,南临渭河,东到武功,西至凤翔、宝鸡县。这里地势大体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又有丰富的水源,有渭河、沔河、汧河、漆水河、横水河、畴沟河等。著名的地下泉水有凤凰泉、润德泉、凤泉、龙泉、马泉等,都为灌溉的有利条件,所以物产丰饶。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周族能够勃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周族自古公亶父从豳(陕西旬邑)迁到周原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势力日益强大,到文王时迁都于丰(今长安县沔水西岸),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自此之后,西周的奴隶制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增长。

第一节 关中农业的兴盛

生产工具 周人素以擅长农业见称从《诗经》的记载看,西周农业生产工具有耒、耜、钱、镈、铎、艾等,在周原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镈,还有铜釜等。双齿的耒和铲状的耜,是周人耕地的主要农具。耕田用人力,通常是两人合作,这就是所谓耦耕。钱即铲类,镈为锄类,供除草用,铎、艾是收割工具。钱、镈、铎 3 字皆从金,以及镈、铜釜等,都属青铜制造。但从现在已经发现的西周农具来看,金属制造的不多,绝大部分仍是木器、石材、兽骨、蚌壳制作。比之商代却有了很大的进步。

土地的利用 周代已发明了休耕轮种制度,创造出我国土地利用的特殊方式。文献中所说的菑、新、畲,就是指农业中的休耕制,具体含意:“畲”是指“不易之地”,岁岁种;“新”是指“一易之地”,3 岁中种 2 岁,休耕 1 岁;“菑”是指“再易之地”,3 岁中种 1 岁,休耕 2 岁。在周代粗耕的状况下,又缺乏施肥的措施,为了保证每年有好的收成,人们按土地肥瘠的不同,采取轮种制度,恢复地力。这种“因地制宜”的措施,在古代也是比较科学的一种耕作方法。这种先进的方法,欧洲到了中世纪,才实行二圃制、三圃制的休耕制度。

栽培技术的发展《诗经》记载西周时，关中栽培的农作物有 7 种，即黍、稷、菽、稻、来（小麦）、牟（大麦）、苴（麻）。关中最早栽培的作物为粟，早在西安半坡遗址就有大量的粟出土。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后稷非常精通栽培技术，他所种植的谷物有在菽、禾、麻、麦等。在菽即豆，禾为类名包括稷和黍，麻在当时为以收获籽实为主的食用作物，麦包括大、小麦。《史记》称后稷处夏禹之际，大致和禹是同时代人，那么后稷种植活动应是 4000 年前的事。根据这样的记载，则黍、菽、麻、麦在关中种植的记录，也就不应少于 4000 年的历史。

水稻在关中的栽培，始见于西周，《诗经》西周诗篇中有 4 处记载水稻的地方，《豳风》记载‘十月获稻’；《小雅·白华》说‘：彪池北流，浸彼稻田。’这里明确记录了人工灌溉的情况。《周颂·丰年》说‘：丰年多黍稌。’稌即糯稻，生长在“涂”中，这里的“涂”就是沮洳之地（地下水位高，地面常年积水）。这说明西周时期，关中人民就已利用低洼积水地栽培水稻，大大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西周关中水稻栽培大概是从汉水流域传入，周人在岐山之下时，就已和汉水流域的一些部落来往频繁，栽培水稻技术的传入，也完全是可能的。

周人对农作物的选种和播种时间是非常注意的，《诗经·生民》记载‘：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秬和秠是

黍的两个品种；糜，赤粱粟 芑，白粱粟，均为粟的品种。黍，今俗称黄米 粟，今俗称小米。在同篇中又说：“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就是说要选择光亮(黄)而美好(茂)、肥大(方)而饱满(苞)的种子。这些“嘉种”，即为优良品种。又有《豳风·七月》记载：“黍稷重穆”。“重”通“穰”，先种后熟者；“穆”，后种先熟者。《鲁颂·閟宫》也说：“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穆，植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穡。”“植稚菽麦”的“植”是早种的；“稚”指晚种者。以上说明不仅对黍、稷、菽、麦选择良种，而且又掌握了不同品种的晚熟、早熟、先种、后种的时间概念。

施肥、除虫方法的应用 西周人也懂得使用绿肥，《诗经·周颂·良耜》说：“其耨斯赵(借为‘削’)，以蔕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里“荼蓼”泛指野草；“耨”是除草工具，诗的大意说用耨削去野草，把它翻在田里，化为肥料，黍稷就长得茂盛了。当时人能把杂草的腐烂同黍稷的茂盛联系起来，可见已意识到绿肥的作用。

除害虫是农业上一件重要的事，《诗经·小雅·大田》说：“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诗说明周人已懂得一切虫子都有向光亮处飞去的特点，用火光把虫子引诱来，并把它烧死，这一种很好的除虫方法，多为后人所采用，唐朝著名的宰相姚崇灭蝗即用此法。说明当时周人已有了防治病虫害的知识。

西周所处的关中地区，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发展仍有很大威胁，例如，农业生产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依靠天然的雨水。《诗经·小雅·甫田》说：“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说明周代的农民仍须向大自然祈求恩惠。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对自然现象还不能作出说明，尤其是在发生旱灾的时候，祈神求雨就成为人们最大的希望。其次是当时受到农具粗笨、土壤耕作还较简单等条件的限制，周人在农业生产上，非常注意技术的推广、改进和继续创新，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粮食的增产就是很有力的说明。《诗经》对当时丰收情景作了逼真的描写，《周颂·丰收》说，丰收年份，季子、糯稻装满了高高的仓廩，有万石亿石之多。另一篇《小雅·甫田》说，庄稼长得茂盛，完全封垅了，像这样长势的庄稼很多；奴隶主的露天粮囤，如大小山丘一样又大又多，黍稷稻粱的贮积，有以千计的仓廩，以万计的粮箱。他们又拿粮食酿成美酒，奉祀自己的祖先，祈求永远得到多福多寿的生活享受。粮食的丰收，也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达情况。

西周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比殷代有所进步，而且又是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大致上达到了具备的阶段，为以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青铜器工业的大发展

周代的手工业，可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主导是官府手工业。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铜器铭文中称之为“百工”。《国语·晋语》说：“工商食官”，这表明工匠是完全隶属于官府的，都是官府的奴隶。这些专业工匠为奴隶主生产着各种产品。关于西周手工业所用工具，过去没有记载，1975年陕西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铜斤 6 件，铜斧 2 件，铜凿 2 件，铜刀 1 件。这些青铜器工具可能是手工业生产工具。

青铜工艺 西周的官府手工业，以冶铸青铜器为主。在武王灭商之前，青铜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水平也比较低。经过武王灭商之后，周人俘获了许多熟练技艺的手工业奴隶，青铜器手工业才很快地发达起来。到康王以后，西周的铜器才显示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周王和各国诸侯以至一般的贵族，都拥有数量不少的大小铜器制造作坊，分布在周统治的全部地区，所以说西周时期所制造的青铜器数量也远远超过商代。历来发现的西周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其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西周的青铜器比商代的变化，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用性增强，酒器减少，礼器、食器、兵器、工具等增多，器形也

由华丽厚重趋向简单轻巧。二是纪念性增强，铭文增多，而且内容广泛，字数扩大，最长的铭文相当一篇古文献。

周原向以我国青铜器产地著称于世。在周原地区，自西汉至今，各个朝代出土商周青铜器从未间断过。现仅以早周都城岐邑一地出土的青铜器列表如下：

2000 年来岐邑出土西周青铜器略目表

次序	主要器名及件数	时代	出土时间和地点	现藏	著 录	备 注
1	尸臣鼎	西周	西汉宣帝神爵中 (前 61~前 58 年) 于扶风美阳			见《汉书· 郊祀志下》
2	酒 尊	西周	东汉章帝建初七 年(82 年)于 美阳岐山			见《宋书· 符瑞志下》
3	师鱼父盃 毛伯钊等	西周	北宋出土于扶风		《商周彝器通考》	
4	大孟鼎	康王	清道光初(1820 年)出土于 京当礼村	中国 历史 博物 馆	同上	铭文 19 行 291 字
5	小孟鼎	康王	同 上	中国 历史 博物 馆	《考古学报》1956 年 2 期《断代》 (四)	铭文长达 330 余字
6	大丰钊	武王	清道光末年 (1821~1850 年)出土于岐山	中国 历史 博物 馆	《考古学报》1955 年 9 期《断代》 (一)	
7	毛公鼎	宣王	同 上		《商周彝器通考》	铭文 32 行 497 字

续表 1

8	大、小克鼎,克钟等 120 余件	夷王和厉王	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出土于法门任家村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大部散佚,其中大克鼎重达 201.5 公斤
9	鬯母鬲	西周	光绪初出土于岐山北乡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金石志》	
10	孟辛父鬲	西周	光绪二十五年出土于岐山		《商周彝器通考》313 页,《陕西金石志》	
11	函皇父诸器伯鲜诸器等百余件	幽王	1933 年出土于今法门康家村,又说岐山青化镇	陕西历史博物馆	《大系考释》《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藏青铜器图释》	出土时间分两次,一次在清季(约 1870 年前后),一次在 1935 年
12	梁其鼎梁其壶等	宣王	1940 年出土于今黄堆任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	同 上	大部佚
13	禹鼎等百余件	厉王	1942 年出土于今黄堆任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	同 上	大部下落不明
14	康季簋	康王昭王	1944 年前出土于今京当周家桥	陕西历史博物馆	《考古》1964 年 9 期	原器重 150 公斤以上
15	函敔毁	西周	解放前出土于今京当乡	岐山县文化馆		
16	虢仲鬲	厉王	同 上	宝鸡市博物馆		

续表 2

17	外叔鼎	周初	1952 年出土于今京当董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	《文物》1959 年 10 期	重达 198.5 公斤
18	父巳鼎 等器 5 件	西周	1953 年出土于今京当礼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藏青铜器图释》	
19	立戈鬲 门 卣	周初	1955 年出土于今京当贺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	同 上	
20	弦纹鼎 等 19 件	周初 中期	1960 年出土于法门召陈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	《文物》1972 年 6 期	
21	几父壶 等 39 件	西周	1960 年出土于黄堆齐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	《文物》1961 年 7 期	
22	尹 丞 鼎 史速方鼎等 9 件	康王	1966 年出土于京当贺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	《文物》1972 年 6 期	
23	牺 尊	周初	1967 年出土于京当贺家村	陕西历史博物馆	《考古》1972 年 1 期	
24	饗饗纹觶 等 4 件	周初	1972 年出土于京当刘家	岐山县文化馆		
25	平沿鬲	西周 晚期	1972 年出土于京当乔家村	岐山县文化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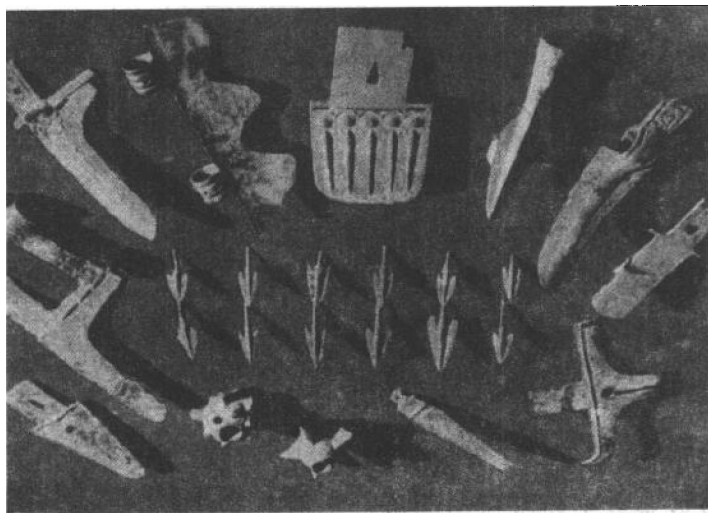
续表 3

26	乳钉雷纹鼎 提梁卣等 13 件	武、成、康、厉、宣	1973 年出土于京 当贺家村	陕西 历史 博物 馆	《考古》1976 年 1 期	为周墓出土 物
27	高足杯 等 3 件	商	1978 年出土于法 门	扶风 文化 馆	《文物》1978 年 10 期	
28	云纹鼎 素面觯	周初	1974 年出土于京 当贺家村	岐山 县文 化馆		
29	师虢鼎 师夷钟 等 7 件	西周	1974 年出土于黄 堆强家村	陕西 历史 博物 馆	《文物》1975 年 8 期	师虢鼎重 105 公斤; 铭文 197 字,师夷钟 重 90 公斤
30	朕匚、卫殷 等 37 件	穆、共、厉	1975 年出土于京 当董家村	岐山 县文 化馆	《文物》1976 年 2 期	其中 30 件 有铭文,最 长的有 207 字,记有土 地出卖、诉 讼等事
31	戠方鼎 等 19 件	西周	1975 年出土于法 门庄白	扶风 县文 化馆		
32	白多父簠 等 9 件	西周 晚期	1976 年出土于黄 堆云塘	扶风 县文 化馆 周原 考古 队	《文物》1978 年 11 期	
33	史墙盘 等 103 件	西周 各 时期	1976 年出土于法 门庄白		《文物》1978 年 3 期	其中 74 件 有铭文,史 墙盘铭文 达 280 余字
34	匱似簠 等 5 件	西周 晚期	1976 年 12 月出土 于法门庄白		《文物》1978 年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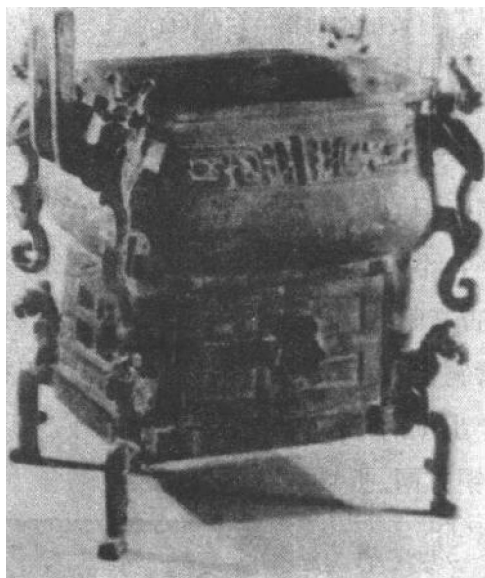
续表 4

35	白窰父盃 等 5 件	西周 中、 晚期	1978 年出土于 岐山凤雏村	周原 考古 队	《文物》1979 年 11 期	
36	厉王猷钫	周 厉 王	1978 年出土于 法门齐村	扶风 文化 馆	《文物》1979 年 4 期	为我国最大的 铜钫,有 铭文 124 字

周原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有的铭文很长,如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达 497 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也是珍贵的史料。这些铭文和古文献互相参证,可以更好地了解西周的奴隶制度。有的青铜器,造型生动,纹饰谐调,布局匀称,刻镂精湛,如 1976 年出土的 103 件青铜器中就有不少工艺非常精美的佳作,如铜方鬲、折觥、戾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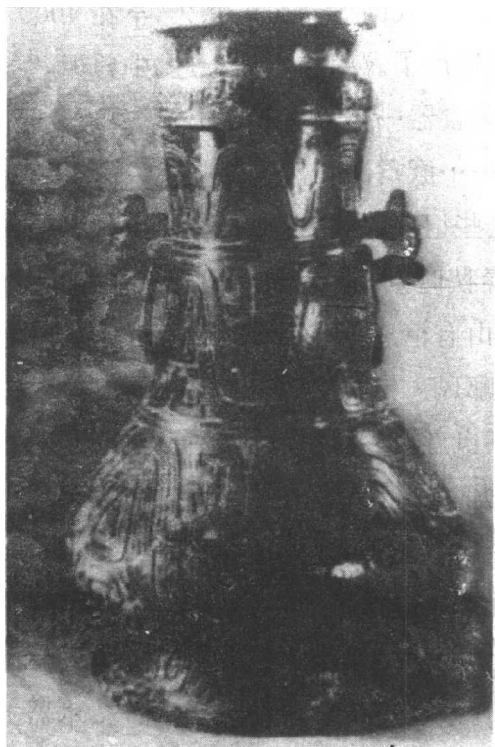
周原出土的西周青铜武器



铜方鬲

铜方鬲,整个形状呈方形,可分上下两层,下层是炉膛,正面有两个门扇,可以启闭,在右门的近合扇处,铸有一个裸体、束、发屈膝跪,坐受了刖戒(即断足)的奴隶。《尚书·吕刑》载:‘刖者使守门。’这个造型是受了刖刑的奴隶守门形象的写照。在左门近合扇处,有一只兽头。一根活动自如的铜条插销,直插在奴隶与兽头之间,开关灵活。像这样的器形,在我国也是罕见的,的确是研究西周青铜器制作工艺以及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可贵实物资料。

折觥: 通体纹饰有三层布局,以夔纹、饕餮纹为主,以

庚
壶

云雷纹衬底，其间配以象、蛇、鸮、蝉等，大小动物互相盘绕，形态逼真生动，饰纹流畅活泼，布局匀称，刻镂精湛，为已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的又一杰作”^①。

庚壶“观其通体纹饰，制作细腻入微，造形生动，作风浑厚，给人以明快舒畅、巧夺天工之感，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能工巧师之匠心”^②。

① ② 陈全方著：《周原与周文化》第 82、81 页。

漆器工艺 我国漆器历史悠久，早在 4000 多年前的虞夏时代就已生产了。《韩非子·十过》中曾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禹贡·夏书》记载：“济河惟兖州……厥贡漆丝。”这就是说，禹时已把漆列为贡品之一了。这些记载，已为近年来各地考古发掘所证实。

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更重视漆树和桐树的栽培，如《诗·唐风·山有枢》：“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诗·邶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等。《考工记》：“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等。这些记载说明我国从西周至战国时期，已大量用漆涂饰车辆、兵器的把柄，日用几案、盘、奁以及乐器、棺槨等物。

1976 年至 1978 年夏，考古工作者在岐山贺家村周围和齐家村等地发掘的百余座西周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片残迹。其中有棺槨上的漆皮、木器上的漆皮、车马饰上的漆皮等。以上周原出土的西周漆器彩绘包括红、黄、蓝、白、黑 5 种基本颜色和各种复色，所用颜料大概是朱砂、石黄、雄黄、红土、白土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染料。扶风黄堆云塘西墓葬出土有似盒、豆等的漆器，腹壁饰蚌泡，并绘有彩色的饕餮纹。又从这些出土器物分析，可知这时漆器多用木胎、皮胎和夹纆胎(用麻布)等胎型。

我国古代制造漆器时，常常要在漆里掺入桐油等干性植物油。在制造彩色漆器时，也要用桐油和各种颜料或染料

构成油彩来绘各种花纹图案，因而形成我国特产的和应用最早的干性植物油。长期以来，人们在制造漆器时是离不开桐油的，所以在古代文献中记载，凡是大量种植漆树的地方也必然种植许多桐树。陕西秦岭山中大量种植漆树和桐树，有可能是西周漆和桐油的来源。

原始瓷器 西周时带釉硬陶比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瓷器和陶器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们的烧制过程是很相似的，可以说，制瓷工艺导源于制陶工艺。由于这些敷釉陶器的外观或成分等方面兼具有陶和瓷的某些特点，所以把它称做‘釉陶’或‘原始瓷器’。至于瓷器的标准，一般认为，由其质料和焙烧温度来决定，瓷器的坯料是由高岭土、正长石和石英混合而成，在胎的表面施有玻璃质釉，在 1200 度左右高温下焙烧而成。烧成后的吸水性差，器皿质地坚硬，扣击它声音清脆。而西周的釉陶已接近于瓷器的水平，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周原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中出土了一批陶器。其中的瓷豆有 3 件，均暗灰色胎，坚硬细腻，器物内外施黄灰色的薄釉，晶莹明亮。瓷罍，其质地与瓷豆同，器物内外施青灰色薄釉。这两种器物，专家鉴定认为已具有瓷器的特点。这是周人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创造的。

着色丝绸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大约在 4 000 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发达的蚕丝生产。

传说，在黄帝时元妃嫫祖发明了人工育蚕缫丝织帛的方法。到了商代，蚕丝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织物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在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出现，也有记载与蚕桑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更有祭祀蚕神的记载，已有大片的桑林，并用‘桑’作为地名。在乐舞中也出现了‘桑林之乐’。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种桑养蚕在全国广大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关中平原已普遍种桑养蚕，桑林成片，养蚕织丝成了妇女的副业生产。西周初年“豳地”（今彬县、旬邑一带）已普遍种桑养蚕和织帛，《诗·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诗说：

春日载阳（春天才暖和），有鸣仓庚（黄鹂在叫）。女执懿筐（你提深筐），遵彼微行（顺着那小道走），爰求柔桑（在那里采嫩桑叶）。春日迟迟，采蘩（蚕出而桑未发时，以白蒿的嫩叶饲之）祁祁（人多貌）。

七月流火（七月火星，向西移动），八月萑（音桓，获也）苇（八月割芦苇，以备次年蚕作茧的蚕箔）。蚕月条桑（养蚕的月份条理桑条），取彼斧斨（音枪，方釜斧子），以伐远扬（指桑条扬起者），猗（猗，曲折之意）彼女桑（嫩桑）。七月鸣？（七月伯劳鸟在叫），八月载绩（八月开始纺织）载玄载黄（赤黑色和黄色），我朱孔扬（红颜色的最鲜明），为公子裳！

这些诗句，都是描写了关中地区的劳动人民，从春天到八月整个采桑、育蚕、作茧、织丝、作衣的全过程。说明西周初年，关中蚕桑生产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汉书·地理志》中说：“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

在西周晚期至秦国前期，诗歌中有许多关中地区种桑的记载，如《诗·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北山有杨。”

《小雅·黄鸟》：“黄鸟，黄鸟，无（勿）集于桑。”《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古人于庭园中多种桑梓），必恭敬止。”《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音娜，盛貌）。”《小雅·白华》：“樵彼桑薪，烝烘于燠（音甚，燠，言我燎于灶）。”《大雅·桑柔》：“苑（音郁，盛貌）彼桑柔（即柔桑），其下侯（兮）旬（有黑色之意）。”《秦风·车邻》《黄鸟》中有“阪有桑，隰有杨”；“交交黄鸟，止于桑”。这些诗句，足以说明西周晚期至秦国的前期，关中地区蚕桑的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西周时期的丝织品实物残迹也不少，如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中出土的红色丝织品残迹，每平方厘米经纬分别为 22 和 26 根。黄土色丝织品残迹，其每平方厘米经纬各为 30 根。还有白色丝织品残迹，每平方厘米经 25 根，纬 30 根。经北京纺织研究所鉴定，认为这些丝织品属于家蚕吐丝，在清洗过程中加入碱性物质。又在此地发现刺绣，而且刺绣印痕上附着红、黄、褐、棕 4 种颜色，残痕中红、黄 2 色特别鲜艳。推测红色是涂上的辰砂，黄色是